

浙江教育近代化的先驱者孙诒让

张 彬

【内容提要】孙诒让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浙江兴学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自 1896 年起,先以私人名义在家乡陆续创办瑞安学计馆、瑞安方言馆、温州蚕学馆和瑞平化学馆等专门学堂,其后又以学务官身份在温州、处州两府 16 个县推动小学和中学的设立。他兴办的新式学堂以学西学、培养实用人才而名噪一时,也因绅商集资兴办的方式引人注目。他从事的兴学活动,不仅使浙南的教育萌发了生机,而且对全省教育的近代化起了先导和表率作用。

一个世纪之前,浙江和全国各地一样,在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同时,教育也进入了从传统向近代化转变的起步阶段。当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致力于批判旧学、传播西学、倡导新学的宣传活动之时,最先将倡导新学付诸实践的是瑞安经学大师孙诒让(1848 - 1908)。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消息使他再也无法继续埋头考据之学,为施展报国之志而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今天,当我们踌躇满志奔向 21 世纪之时,缅怀孙诒让的兴学业绩,弘扬他的爱国精神,对于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

浙江是传统教育基础十分深厚的地区,南宋以来科名仕宦冠于全国,堪称人文荟萃的文化之邦。浙江地处东南沿海,鸦片战争以后就有宁波、温州等地相继开埠,因而也是较早接受外来经济冲击和文化影响的省份。当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发生冲撞之时,每一个知识分子都面临着痛苦的抉择。大多数知识分子在长期封建传统教育中形成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一时难以改变,固步自封,坚守传统,反对变革。但也有一批知识分子,饱受前辈经世致用学风的熏陶,忧国忧民的思想特别强烈。他们摒弃了盲目自大的传统心理,在中外经济、文化的比较中,感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强盛和西方教育的进步,开始把目光从古圣贤的经典移向域外世界,希望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道路中寻求中国富强的良方。孙诒让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孙诒让的家乡瑞安隶属于浙江东南部的温州府,背山面海,又有飞云江横贯东西,土壤肥沃,气

作者:浙江大学教育系副教授(杭州 310028)。

候宜人。该地受永嘉学派渊源流长的学风影响,文人学士辈出,且向有注重实事实学的传统。孙诒让的父亲孙衣言和叔父孙锵鸣均为清末翰林,同是永嘉学派的传人。前者历任安庆知府、湖北布政使、江宁布政使、太仆寺卿、上书房侍讲等职,后者先后掌教苏州正谊书院、南京钟山书院、上海龙门书院和上海求志书院。孙诒让自小受家乡人文环境的孕育和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一方面造就了深厚扎实的经学根底,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救世振敝”的为学宗旨和“务实”、“应时需”的治学态度。他虽几十年埋首经学,却从来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迂腐顽固之人。他之所以倾注大半生时间注疏《周礼正义》一书,是认为“中国开化四千年,而文明之盛莫尚于周。故周礼一经,政法精详与今泰西东西诸国所以致富若合符契”,试图从《周礼》中寻找治国良方。他之所以精心研治《墨子间诂》,也是赞赏墨子关于强本节用、兼爱非攻、劳身苦志、应变持危的思想,以为这种思想在当今之世也有值得提倡和借鉴之处。正因为如此,面对西学东渐的滚滚潮流,他就不像一般的封建士大夫那样恐慌、抵制和排斥,而是始终抱着学问无分新故、无分中外、“唯其致用”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不受门户之见所限的博大胸怀,为他接受西学、转变观念铺平了道路。

孙诒让早年跟随父亲往来于京城和江淮之间,走南闯北的阅历不仅使他眼界大开,也有机会交往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收益匪浅。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章太炎、梁启超等与他有书信往来,维新运动中活跃于京、沪、浙的浙籍人士黄绍箕、宋恕、汪康年、汤震、张元济等均与之关系密切。因家乡远离省城,消息极为闭塞,为能及时了解外界的情况,孙诒让订阅了大量的报纸杂志,如外国传教士办的《万国公报》,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的《时务报》、《经世报》、《湘报》、《知新报》、《新民丛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杭州白话报》、《浙江潮》、《民报》等。他也购买了不少当时影响较大的新书译著,如汤震的《危言》、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谭嗣同的《仁学》等。正是由于如此广泛的结交和如此广泛的阅读,使他虽僻居家乡,却能随时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不断从新书新报中汲取新知和力量,从而在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渐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

而真正促使孙诒让走上资产阶级改良道路的,则是严重的民族危机。年轻时即以经学上的成就而扬名的他在科场上却连连失意。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年近五旬的孙诒让正好在北京参加礼部会试,但依然不中。国家战败的耻辱,个人科场的失利,使他痛定思痛,幡然醒悟:自己大半生倾心研究的经学,原来“刍狗已陈,屠龙无用”;多年来孜孜追求的科名仕宦,也是索然无味,于国无补。孙诒让与其他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在国家遭受危难之际,激发起极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此断绝功名之念,放弃考据注疏之学,毅然走上了居乡兴学的教育救国之路。

二

浙江新式学堂的兴办不算太早。19世纪60~80年代,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地已出现实施“方言”教育、“武备”教育和科技教育的洋务学堂时,浙江除了少数教会学校外,全省教育仍基本按照传统的模式在那里运转。这种状况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得以改变。1894年,甲午战败的耻辱惊醒了国人;紧接着,变法维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席卷而来。浙江人在北京任官者颇多,在上海做事的也不少。这期间京、沪、浙三地的浙籍先进知识分子表现得异常活跃,他们或成立学会,或创办报刊,或发动兴学,彼此间来往密切,声气相投,共同奏响了浙江教育近代化的前奏曲。然而,最早冲破旧学藩篱、创建新式学堂的并不是省城杭州的开明官吏或士绅,而是浙南瑞安的孙诒让。

孙诒让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是培养算学人才的瑞安学计馆。他认为算学是西学中最重要

习历算的传统,以此打开缺口,容易得到绅商们的支持,减少各种阻力。瑞安学计馆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正式开学,孙诒让在《瑞安新开学计馆序》一文中明确提出,办馆的目的是培养新式人才以适应时代需要,大处讲可“待国家之用”,小处说亦可“以泽乡里。”学计馆和传统的算学不同,它要求学生不仅要精通历算,掌握一定的专门技术,而且应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立志变法图强的抱负和宏愿。在教学上,学计馆一方面开设中外算学、物理、化学、体操等近代课程,购置各种西学书籍、挂图和仪器设备;另一方面也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时事政治教育,经常讲授“中外交涉事务、各国记载及近时西人所著格致诸书,每日择简明切要者,讲习一、二条,以广见闻而裨实用。”

在此后的几年中,孙诒让又创办了三所专门学堂。一所是仿照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例,于光绪二十三年开办的瑞安方言馆,以学习东西文为主。光绪二十七年,为节省开支,该馆并入学计馆,改名官立瑞安普通学堂,设中文、西文、算学三个班。一所是同为光绪二十三年开办的温州蚕学馆。孙诒让认为养蚕是浙江传统的副业,丝绸业本是“我国独擅之利”,面对东西方国家的激烈竞争,必须开设一所用科学方法训练养蚕技术人才的学堂,“搜集历来相传的中国种桑养蚕古籍,兼乎近代新译出版的法、意、日本各国蚕桑学书作教材,以资教习。”另一所则是孙诒让与瑞安金晦、平阳杨景澄、吴庵箴等人集资,于光绪二十五年在温州城内建立的瑞平化学堂。在孙诒让看来,算学是学西学的基础,化学是致富的灵丹妙药,“泰西之学,由艺以通于道,而化学尤为专家盛业,究极微妙,弥纶大用。”只要懂得了化学,农工商各业可以做到“一艺百获”、“其益无穷”。这种说法虽有夸大之处,但在当时对于宣传科学、促进科学教育无疑是有益的。

孙诒让在瑞安、温州一带率先开办的四所专门学堂,其中瑞安学计馆、温州蚕学馆、瑞平化学堂是国内同类学堂中最早的专门学校之一,瑞安方言馆则是浙江近代最早的外语学校。这些新式学堂以学西学、学实学、培养实用人才而名噪一时,也因绅商集资兴办的方式引人注目。它们的创办,不仅使温州一带的教育顿时萌发了生机,而且在浙江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全省教育的近代化以至全国教育的近代化,起了先导和表率的作用。

孙诒让在兴学初期,因急于培养“应时需”的专门人才,以创办专门学堂为主;以后认识到发展新教育必须从头抓起,并且应以尽可能多的国民为对象,逐渐转向发展基础教育,兼及培养师资的师范教育。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温处学务分处宣告成立,孙诒让被温州、处州两府学界公推为温州学务分处总理。于是他便开始在浙南两府16个县全面实施其教育构想和兴学计划。温处学务分处自成立之日起至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孙诒让病逝而撤消,仅存在不足三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尽管由于守旧的官吏、劣绅、儒生百般刁难破坏,以致“怨谤间生,阻碍百出”,以及由于筹集学款、征募校址等问题,与方方面面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孙诒让仍依靠两府绅商,凭着满腔的热情、坚强的毅力和无私的精神,克服重重阻力,筹集经费50万,成立各级各类的新式学堂二百余所,加上温处学务分处成立之前所设立的学堂,温、处两府的新式学堂共达三百余所,使浙南的新教育得到很大的发展。

众所周知,浙江的杭嘉湖、宁绍地区,自然条件优越,人民生活富裕,教育一直比较发达;而浙南各县大部分以山地、丘陵为主,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尤其处州府的庆元县、景宁县和温州府的泰顺县等均为“九山半水半分田”,人口稀少,历来是文化教育的荒漠地带。正因为浙南、浙北的差距甚大,孙诒让的清末兴学从家乡瑞安开始波及到温、处各县,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根据清末浙江有关教育的统计,温、处两府的中学堂和实业学堂数量明显高于全省的平均数,小学堂数量虽然不显优势,但这与两府各县山地多、人口少有很大的关系。可见,孙诒让不仅以瑞安学计馆的创办最先拉开浙江近代兴学运动的序幕,而且以其出色的兴学业绩使浙南和浙北的新教育同时起步,比翼齐飞。

三

在清末浙江的兴学运动中,孙诒让是筚路蓝缕的先行者,更是硕果累累的成功者。考察其教育思想和实践,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动绅商,大兴私人办学之风。

温州一带历来文风鼎盛,各县各乡取得功名者多,世代为官者多,士绅阶层势力较大。他们原本以儒学为立身之基,中外通商以后逐渐开始分化:一部分投资开办企业,或转而投入商界,这些人眼界开阔,思想束缚较少;即使在大部分居于乡间的士绅中,甲午战争以后,弃旧学求新学的风气也越来越盛。孙诒让懂得兴办新式学堂不能仅仅依靠官办,还必须依赖民间,采取私人办、众人集资办等多种形式。他深知在绅商中向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也有捐资兴学的潜力可挖,关键是如何组织发动,如何募集学款。总结孙诒让的做法,首先是自身带头捐资,亲作兴学的表率;其次是成立各种学会,集结绅商的办学力量;再次是通过大量宣传,鼓动绅商的办学积极性。他的兴学活动前后共计13年,期间温、处两府兴办的309所学堂中,官办的只有30所,主要是中学堂、师范学堂,其余279所均为私人捐建或集资兴办。由此可见,在孙诒让的组织发动下,民间绅商成了浙南兴学舞台上的主力军。

第二,争取支持,借助行政力量兴学。

自1896年浙江第一所近代新式学堂瑞安学计馆创办起至1904年的九年中,先是瑞安、温州等地有几所专门学堂,以后温州府各县也先后创办了一些初等、中等学堂。然而,孙诒让并未满足于此,他身在瑞安,心系整个浙南教育,尤其对处州府各县尚无一所新式学堂出现而自己一介布衣难以跨越地区有所作为的状况感到不安。出于对国家、民族的一种责任感,他坚信“非广兴教育,无以植自强之基”,必须对广大人民实施普通教育。当时正值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为推动各地兴学,明令省城设学务处一所。经留日学生黄群、吴钟、陈琪的提议,孙诒让等人即以温州、处州两府偏僻为由,强烈要求两府合设一学务分处,以利新教育的推行。温处学务分处成立后,孙诒让即作为负责人以学务官的名义,依靠两府有能力且热心教育的地方名绅作助手,在浙南这片以山区、丘陵为主的土地上,创办了一大批新式学堂。

第三,改良风俗,推动地方兴学。

近代学堂的出现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必然会遭到传统习俗的反对,因此,孙诒让在兴学的同时还致力于宣传新思想,注重对地方风俗的改良。光绪二十八年冬,他发起组织瑞安演说会,规定每月初一、十五开常会,召集城郊各学堂师生及农工商各界到会听讲,演说内容包括中外历史、中外时事、科学知识、县政革新、农工商实业等专题。据回忆,“每次演讲,坛无隙地,亦无中断,中外时事尽输各界脑筋,收效极大。”成立演说会的同时,孙诒让还在瑞安城内成立劝解妇女缠足会。解缠是妇女走向文明、寻求解放的第一步,他要解去的不仅是束缚她们的缠脚布,还要打开禁锢妇女身心的传统势力的枷锁,还她们被剥夺了的受教育的权利。光绪二十九年,孙诒让与萧侃共同创办了女学蒙塾。该女塾是浙南第一所女子学堂,也是浙江近代最早的女学之一。在他的提倡下,浙南随后办了不少女学,截至光绪三十四年初,全省女学共计46所,温、处两府就有20所,占了将近一半。

第四,训练师资,巩固兴学成果。

在新学堂创办初期,随着教学内容的更新,最感困难的是师资问题。省城学堂的西文、西艺课程,一般都是重金聘请外籍教习,或是聘用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任教。温州地处僻壤,交通不便,外地人均不愿应聘,因而教师大多仍为本地的塾师和儒生。他们对西学一无所知,教学方法也十分陈

旧。若不改变这种状况,新学将陷于有名无实的境地。为解决这一矛盾,孙诒让在光绪二十九年与林文潜等人成立师范教育研究会,以研究解决各学堂师资问题为主旨。同年,他又组织了师资读书社,购置与教学有关的书籍、报刊,供大家借阅,提倡相互探讨,相互交流教学经验。这确实不失为因地制宜、提高师资水平的好办法。以后,他在进一步发展地方教育的同时,又先后开办了几次培养师资的讲习班,如音乐讲习班、博物讲习所、理化讲习所等。靠短训班培养师资只能解一时之渴,终非长久之计。光绪三十四年,孙诒让积极筹办的温州初级完全师范学堂正式成立,为以后浙南新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大批受过专门训练的师资。

孙诒让是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浙江兴学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在国难深重的关头拍案而起的爱国精神,以发展“本州教育为己任”、团结绅商艰苦办学的务实精神,以及淡于名利、任劳任怨、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年,有多少像孙诒让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厄运,在“教育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披肝沥胆,奋斗不已。今天,为了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富强,同样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以先人为榜样,脚踏实地,为实现“科教兴国”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注:

孙诒让:《周礼政要叙》,见《籀遗文》,1926年印行。

孙诒让:《周礼政要通艺》,瑞安普通学堂刊行,1902年。

孙诒让:《瑞安新开学计馆序》,见《孙诒让遗文辑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

孙诒让:《瑞安算学书院章程学规》,1986年石印本。

孙诒让:《为创办蚕学馆告温州同乡书》,见《孙诒让遗文辑存》。

孙诒让:《记瑞平化学堂缘起》,见《孙诒让遗文辑存》。

孙诒让:《报支季卿提学书二通》,见《孙诒让遗文辑存》。

郭宰平:《孙诒让先生致力教育及地方事业史略》,载《温州文史资料》创刊号,1985年。

[责任编辑 陈 双]